

拿什么反对你：李嘉图 PK 《谷物法》

许斌*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4期40-43页

海岩的小说《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吸引了无数读者。本文的标题显然是模仿之作，并无创新之处。学过国际贸易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关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谷物法》（Corn Laws）的内容也是耳熟能详，无非是讲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样一篇内容缺乏新意，标题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文章，岂不是在忽悠《茶座》的茶客！

也许是我在茶坊里混得久了，脸皮不觉也厚了起来。不管您的想法如何，我先在这里泡上一壶您似曾相识的清茶，您不妨一喝。如果咂出点新味来请叫声好。如果要抱怨也甭怨我，那是茶坊小二（小洪兄）在 HR（人事管理）上犯了错。

说到李嘉图，我们尊其为国际贸易学之父。但这是他成名以后获得的尊称，年轻时他就是个炒股票的主。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移民家庭，李嘉图的父亲是一位证券经纪人，而李嘉图在少年时就跟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据说在一次乡村度假中，27岁的李嘉图阅读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从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中国的超市中见到《国富论》被放在各种畅销书之中时常常发笑。看来我是何其短视，也许在我发笑之时，一个中国未来的“李嘉图”正在孕育而生呢！

英雄是时势造就的。风平浪静之时何来驾驭海浪的舵手？而在风大浪急时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成不了英雄；也有人在风浪中横冲直撞，逞一时之勇，他们很快就被风浪吞噬了，也成不了英雄（或许会被追认为“英雄”？）。能够成为英雄的首先是弄潮儿，有着高超的技巧，拨弄大风大浪于股掌之中。他（她）知道风险带来的收益，也知道伴随风险的成本，总能在风口浪尖上有惊无险地博得大自然给予的最高奖赏。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中，这样的人在英雄榜上会有一席之地。但谁又能成为千古不朽的真正英雄呢？

李嘉图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由于工业化和人口的增长，英国当时由粮食出口国变为了粮食进口国。在英法战争期间，由于拿破仑对英国实施了封锁政策，致使英国的粮食进口一度中断，并险些为此输掉战争。当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时，英国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不得进口。《谷物法》实施后英国谷价高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成为主要受益者。与此同时，《谷物法》的实施使工资成本上升，侵蚀了工业利润，因而工业资本家成为受损方。围绕着《谷物法》的存废在英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用阶级成分论来分析，李嘉图一定是站在工业资本家这一边的。果不其然，李嘉图站出来反对《谷物法》。怎样让人民大众相信一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经

*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感谢刘瑛对文中部分材料所作的贡献。

经济学家的观点呢？这个经济学家一定不会说我反对《谷物法》因为它损害了我的利益。他一定会说我反对《谷物法》因为它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怎么证明这一点呢？这就需要技巧。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首先需要技巧，能够让人信服地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只会引经据典来吓唬人，说某某伟人曾经怎样说云云，那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李嘉图的论证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英国生产一桶酒需要 120 个人，生产一匹布需要 100 个人；而葡萄牙生产一桶酒只需要 80 个人，生产一匹布只需要 90 个人。尽管葡萄牙无论在酒的生产上还是在布的生产上效率都比英国高，有绝对优势，但葡萄牙关起门来自己生产酒和布并不划算。如果葡萄牙用生产的酒来交换英国的布，葡萄牙人民将能够获得更多的消费福利。李嘉图用这个例子论证了一个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而且这个好处来源于每个国家都有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① 英国的比较优势在工业品上，所以应该多生产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而不是用《谷物法》来保护英国国内的农业部门。《谷物法》会使英国人民失去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所以大家应该和我李嘉图一起反对《谷物法》，这和我李嘉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克鲁格曼在其教科书中指出，用特定要素模型描述 1817 年的英国经济无疑比李嘉图模型更为合适。^② 在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贸易收益分配到了每个劳动力的头上。所以李嘉图模型掩盖了贸易收益背后尖锐的收入分配问题。特定要素模型假设生产农产品不但使用劳动力，而且使用农业特定的生产要素土地；生产工业品不但使用劳动力，而且使用工业特定的生产要素资本（机器）。如果英国废除《谷物法》，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那么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会受损，而资本所有者会获益。克鲁格曼认为李嘉图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回避收入分配的模型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李嘉图在代表某个集团利益的同时，强调的是整个国家的收益。克鲁格曼称之为“一个聪明的和十足的现代策略”，并称李嘉图为“将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先驱”（《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六版，中文版第 61 页）。

茶喝到这里，似乎已经达到了高潮。熟悉国际贸易理论的茶客们一定会说，这是用新杯泡旧茶，让人喝得不过瘾。先别着急，我这里还有最后一道茶点。李嘉图模型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既出乎意料，又在逻辑之中，不愧为经济学理论的精品。在萨缪尔森遇到数学家尤兰姆“经济学中哪条定理既正确但又不是显而易见”的诘问时，比较优势理论正是萨缪尔森能够想出来的最佳答案。^③ 但是李嘉图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从这个模型中推导出来的贸易收益是经济开放后所能获得的一次性收益。为什么会有这个收益？因为国际贸易改进了资源在全球经济中的配置。如果用大家所熟悉的供求模型来描述，相对于资源最优配置的自由贸易均衡，在贸易保护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存在扭曲，在供求曲线图中表现为两个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的三角形，即“哈柏格三角形”（Harberger's triangle）。顺便提一句，已经八十多岁的哈柏格（Arnold Harberger）教授出席了今年（2008 年）四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就汇率理论作了主题演讲，其思维之清晰和深邃，让人敬佩不已。哈柏格三角形衡量

^① 参见拙文“比较优势和战略优势”，《经济学家茶座》，2003 年第 4 期，第 63-65 页。

^② 特定要素模型又称为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

^③ 参见拙文“经济学胜在出乎意料”，《经济学家茶座》，2005 年第 2 期，第 57-60 页。

了取消贸易保护会带来的一次性收益。实证研究表明，这个收益在数值上并不大，例如对美国的研究得出的数值是国民收入的 0.26%，对发展中国家（土耳其、菲律宾和巴西）的研究得出的数值是国民收入的 5%-10%。^④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李嘉图在反对《谷物法》的演讲中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而突然有人站起来指出李嘉图的推理虽然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在数值上微不足道，只能给英国带来相当于国民收入 0.5% 的收益，李嘉图的雄辩之言将大打折扣。在这场辩论中，李嘉图能否拿出新的招数来出奇制胜？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芬德利教授（Ronald Findlay）最早指出了李嘉图在反对《谷物法》时使用了一个动态模型。在《国际经济学手册》第一卷中，芬德利撰写了“贸易模型中的增长和发展”一文。芬德利指出李嘉图在 1815 年所写的“谷物价格下降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将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动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农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劳动和土地，工业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而资本是用来雇佣工人的“工资基金”。资本所有者将工资基金投入到农业或工业中去追求最高的利润回报，再将获得的利润用于下一期的生产中。李嘉图假定土地所有者会将地租用于消费，而不会像资本所有者那样将获得的利润用于再投资。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随着工资基金的逐步积累，工业品生产不断扩大，因而工业品价格不断下降，直至利润率等于零从而经济增长归于停滞。而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一个小国所面对的是世界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并不会随着该国资本积累和工业部门的扩大而下降。如果该国在工业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贸易开放会使该国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提高该国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由于资本所有者会将盈利投入到下一期的生产中去，因而贸易开放通过提高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利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嘉图的这个动态模型中，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是一次性的静态收益，而是指由于世界价格保证了这个开放小国能够持久获利而由此实现的长期收益。当李嘉图亮出这个动态模型后，他的论证变得非常强大。在同《谷物法》的维护者们（其中包括人口论的鼻祖马尔萨斯；后者强调“粮食安全”）的 PK（辩论）中，李嘉图无疑是胜利者。

李嘉图和《谷物法》的故事讲完了。在李嘉图的时代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即使追认李嘉图为诺奖得主也不能彰显其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我很喜欢克鲁格曼对李嘉图和《谷物法》之争的评论：“政治和知识进步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大约一个半世纪前，《谷物法》就已经被废除了。然而，李嘉图的贸易模型仍然是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⑤ 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英国一样，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呼唤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她）拥有高超的思辨技巧、深邃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弄潮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但更重要的是，他（她）的思想是顺历史大潮而动的，能够为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带来福祉。

^④ 参见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六版，中文版第 217 页。

^⑤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六版，中文版第 61 页。